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学科内涵与精神气度^①

刘鸿武

【内容提要】学术乃人类探索未知世界之高深思想，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精神品质与心灵境界。同时，学术又是治国之大器，经世之方略，于国家民族之兴衰成败影响甚大。当今之世界，多元文化碰撞激荡，各种思潮往来竞逐。中国历来秉持兼容并包、平等交往之原则弘扬人类思想文化，坚信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民族之复兴大业，乃最符合国家利益之理性战略选择。但中国能否以和平之方式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国际思想与价值理念的高地上建构自己富于竞争力的话语平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是否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重。就此来说，中国非洲学的建构意义，自当置身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把握，并寻求其开阔通达之“中国学派”形成的发展路径与气度。

【关键词】学术思想；国际竞争；非洲学；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刘鸿武，浙江省“钱江学者”省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① 本文是笔者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09JZD0039）的阶段成果。

引言

学术乃治国之大器，经世之方略。一国之学术与思想，能否开放包容而不依附跟随，自主创新而不故步自封，于国家民族之兴衰存亡干系甚大。在今日全球思想与价值观念高速流动而相互激荡的时代，一个国家，尤其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其学者的学识与眼界，胸襟与抱负；其国民的观念意识与文化自觉；其传递和吸纳本国与他国思想文化的能力等统合在一起，会从根本上决定该国在全球思想平台上的位置。

今天，学术与思想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中心舞台，而在国际学术与思想竞争的背后，更存在着巨大的国家发展与安全利益。在此背景下，国际思想文化的交流，既可能承载着和平友好的使命，也可能在某种条件下变为强者对弱者进行文化侵蚀和实施话语霸权的工具。就中国而言，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与民族之复兴大业，乃最符合国家利益之理性战略选择。但中国能否以和平之方式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国际思想与价值理念的高地上建构起自己富于竞争力的话语平台，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是否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与尊重。也就是说，中国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与中国在国际思想高地上具备怎样之创新能力和影响力，实有莫大之关联性。中国非洲学的建构意义与目标、宗旨，自当放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把握，来开拓探寻其开阔通达之发展路径与目标、宗旨。

问题一 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与可为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非洲研究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与支持条件获得了很大改善。^①在此背景下，影响中国的非洲研究事业进步的因素正日益明显地来自学科内

^① 相关情况，参见中非合作论坛网站有关报道：<http://www.focac.org/chn/xsjl/zf-hyjiljh/t852795.htm>。

部,即学科本身的主体意识觉醒、发展路径选择、知识与思想的原创能力提升,及与之相关联的专门化知识体系建构与工具方法的进步问题。^①

与此同时,随着中非关系快速发展及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对非政策和中国在非洲的作用问题,也已经日益超出中非关系范畴而牵动着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变化,成为“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关键支点”。在此背景下,非洲问题之研究,包括牵涉其中的有关非洲发展道路选择,非洲发展前景及中国对非政策之作用与角色问题的种种学术争议与思想解读,也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中国与西方发生真正的思想交锋与观念对峙的领域。

上述客观情势的变化,推演出一系列重大的时代命题与思想挑战,要求中国的非洲研究作出认真的思考与回应。中国的非洲研究不可再零敲碎打,大玉碎敲,在低层次上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工作,并居于中国学术的边缘地带自说自话,而应置身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中非发展合作与亚非思想重建的时代大背景下来理解自身的目标与宗旨,建构起自己开放形态的主体理念与时代意识,并加入到当代中国思想创新与知识创造的主流大潮中去,为当代中国学术民族精神之重建作出自己的特殊努力。

就此来说,笔者认为,以中国的非洲研究事业之长远发展计,离不开对如下这样一些境界上依次推进的本体性命题的追问与思考。

第一,在当代中国学术体系中,所谓的“非洲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

^① 近些年,本着“但开风气不为先”的愿望,笔者在学界同人鼓励帮助下就中国非洲研究的理论形态与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在此谨向梅新林教授、李慎明教授、秦亚青教授、王逸舟教授、杨洁勉教授、曲星教授、朱威烈教授、朱立群教授、杨光教授、李安山教授、张宏明教授、吴锋民教授,及刘贵今大使、张明大使、卢沙野大使、舒展大使、曹忠明大使特致谢忱。相关内容请参见刘鸿武下述著述:《初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1期;《在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建构国家话语权——再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的特殊时代意义》,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5期;《非洲研究与中国学术“新边疆”》,载《光明日报》2009年11月9日;《论中非关系三十年的经验累积与理论回应》,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1期;《中非发展合作与历史理论创新》,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5期;《中非发展合作与人类现代文明的再塑造》,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反思与“亚非知识”话语权重建》,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1期;《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维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推进有特色的中国非洲研究事业的发展——关于建构有特色的“中国非洲学”的若干思考》,载《非洲研究》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刘鸿武、罗建波:《中非发展合作: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相对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如果可以，那如何理解它的学科内涵与体系结构？如何建构它的理论体系、知识工具及概念术语？其独特之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观察手段又有何特点？形下之实证田野调查与形上之抽象理论创造二者如何互动支撑？

第二，作为一门具有跨学科与多学科综合研究性质的学科，支撑这一学科的基础学科与邻近学科有哪些？如何融会贯通地从中国传统国学、外来西学及当下中非关系实践等不同领域获取促进自身成长之思想智慧与知识养分，并在借鉴吸收的过程上形成自己的学科个性与学科品质？

第三，从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关联互动的角度看，中国非洲学当下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否可以选定“当代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作为当下中国非洲学集中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的联合攻关研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征与民族个性的中国非洲学的核心竞争力与话语优势？

第四，在国家和社会对非洲研究期待日益提升的背景下，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非洲学人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及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在保持学术独立与自尊、潜心追求学术自身价值与积极主动服务国家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非洲研究如何执“经世之学”与“真理之学”两用而并行不悖？官、学、企之多方关系又如何张弛有度？

第五，如何从国际思想竞争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背景下来理解中国非洲学可能具有的思想创新的特殊潜力？如何从全球发展多元对比的框架下对中非发展合作进程及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总结，以为新时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与素材，进而推进中国视野下的“新发展经济学”、“新发展政治学”及“新国际援助与合作理论”诸学科的形成？

第六，如果说当代中非关系是中国当代对外关系中一个可以由中国主动予以把握的领域，其间充分彰显着中国外交的民族个性的话，那么作为对这一关系进行理论思考与知识提炼的中国非洲学，其发展进步是否会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学术全球襟怀的拓展和民族精神的成长？其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世界史学诸学科走出长期以来跟随依附西方话语之窘境而获得自主发展，是否可以产生某种特殊之增益作用？

第七，最后一个更为形而上也可能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如果说学术乃国家民族精神之象征，那么一种呈现出中国气度、中国胸襟的非洲学，

其治学境界与思想维度当如何塑造?一种呈现中国学术民族精神与气度之“道”的非洲学,其心灵关怀与精神追求又有何独特之处?

概而言之,在非洲研究这一最初由西方开创且今日西方的学术和话语仍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学术思想领域,如何以中国的立场和方式展开思考,深化研究,突破事实上存在的西方知识与话语霸权的阻遏,坚实有力地建立起属于中国的“思想与学派”的知识体系与话语形态?此般诸多问题,并无固定之答案与简单之结论,但通过适当之慎思明辨而厘清困惑,树立一种举高慕远之志向,对中国非洲学之长远发展当有特殊之助益。

从总体上看,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今日世界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在精神产品生产与传播上仍拥有绝对优势。然而,在21世纪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今天,历史的转折正展现出新的希望和前景,同时也激发着更复杂的反应与博弈。面对变动中的局势,近年来,西方国家已经明显地从战略上加强了对非西方国家的观念渗透和文化攻势。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走向世界而与他者相遇的过程中,面对的不仅仅是各国各地区的本土思想与文化,更面对着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文化优势和话语霸权的西方思想与文化。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支持对外扩张,秉持和平发展目标的中国也不会谋求话语霸权,因而中国不与他人搞文化与意识形态对抗,但是,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却不能不意识到国际思想文化竞争与交往的重要性,不能不对西方的强势和自身的差距,以及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可能面临的思想与文化挑战有清醒的认识。

由此看来,包括中非合作在内的整个发展中国家今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国际交往与发展合作,其意义除了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的发展力量,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文明的复兴之外,还包含了格外的要求,格外的时代使命,那就是需以自身的当代发展与知识经验,从源头上参与对全球现代性思想话语的建构塑造,参与对人类文明核心理念之内涵及本质的重新理解与再度诠释,以此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褊狭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在现代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文化、观念道德的标准与原则方面,在种种有关理性、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性的人类价值体系建构中,相应地加入亚非人民或非西方世界的传统的与当代的知识形态与实践智慧,从而拓展和扩大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丰富现代文明的结构与基础。这是一种全球知识与思想的重新建构进

程，一种人类思想体系的全球再塑造过程。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历史性的重建，拓展出人类思想与智慧的新的广阔空间，人类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性引起的种种问题与挑战，确保文明和全人类的健康发展。

从长远的战略高度上看，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竞争领域，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特别重视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更需要重视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发展权”、“话语发展权”。对此，中国应该有十分清晰的立场表达，立足于中国方位提供全球性的推进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的思想框架、知识产品、话语体系。在这方面，当代中非发展合作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则有希望成为一个特别的思想温床，一个可资依赖知识创新的活水源头，能够有力地支持 21 世纪亚非世界建立新的具有时代创新精神，同时又深刻包含自身古老传统的思想和知识创新。而这，正需要中非双方的学术界、思想界加强联合与合作，共同努力建构面向新世纪的具有亚非世界以及全球多边特性的知识生产与思想交流平台。可以期待的是，作为中国思想智慧与民族精神的当代表述，一种呈现出中国胸襟、中国气度的非洲学的创新性建构与传播，必将对中国学术现代品质之锻造——诸如主体意识之觉醒、全球视野之拓展、普世情怀之建构、中国学派之形成等等，产生特殊的增益作用。

问题二 国际思想交锋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我们说，在当今之世界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激荡，各种思潮理念争奇斗艳的背景下，国际思想文化的交流，既承载着和平友好的使命，也可能在某种条件下变为强者对弱者进行文化侵蚀和实施话语霸权的工具。而对于思想文化的力量，西方国家似乎比我们理解得更深刻，投入的精力也更多。过去数十年，西方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思想优势的保持与学术话语霸权的掌控。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在推进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西方通过持续性地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民主援助”战略，将经济援助与意识形态输出挂钩，以援助为手段在发展中持续输出西方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西方用大量的经费资助扶持发展中国家各类学术机构、民间智库、出版网络、媒体机构，以此介入当地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和媒体界，影响其价值理念与思想倾向。观察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此

起伏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之复杂表现,分析2010年年末以来北非与中东国家政局动荡之前因后果,可以看出经过二十多年推进,西方在发展中国家传播其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的“民主援助”战略已取得明显成效。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因经济落后,相关投入不足,其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民间智库、媒体网络因此常须接受西方经济援助,由此也与西方形成一种特殊的依存关系。西方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援助非洲国家的思想学术机构,自然有其长远的战略目标,有其巨大的国家利益的考虑。尽管不可一概而论,但作为一个整体,西方“思想文化援助”的真实目的,仍然是希望通过一种潜在而隐蔽的方式,通过传播其特殊的理念与价值观,来达到维护西方长期以来的霸权地位和特殊利益。特别是,西方在传播其特殊理念与价值观时,通常将其包装在一整套精心设计且极为复杂的话语体系中,且依照时势需要,转换成诸如“民主”、“自由”、“人权”等外表光鲜亮丽、具有不容置疑的道德正当性的概念,并将其广泛渗透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各领域,以无形之方式,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社会精英、知识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思想和意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二十多年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有目的的附加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内容的援助,西方强化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理念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学术机构和思想精英在思想观念上与西方的趋同化。西方也因此也在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实现了某种“情势逆转”,使自己重返了道德话语的高地。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时期,发展中国家高举反帝、反殖、反霸的话语旗帜因而占据道德高地和话语优势的情势不同,今天,面对西方以强大投入战略和偷天换柱之技法精心包装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意识形态话语攻势,发展中国家往往因缺乏积极有效的回应手段而处于被动受损的弱势地位,许多时候陷于“集体失语”的沉寂状态,或是随波逐流,被动跟随依附于西方之强势主流话语。这种情形的出现,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话语体系、思想知识创新能力、学术研究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跟不上自身发展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发展权”受到限制,“话语发展权”受到侵蚀,相对于西方,形成了新的发展差距、思想洼地与知识鸿沟。

西方国家持续的意识形态新攻势,西方精心建构这一阻遏发展中国家复兴发展的思想高墙,正对全球战略格局之变动趋势产生复杂影响。在此

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并因此而获得成功的中国，在许多西方政客和心怀偏见的学者心中，自然就成了一种冲击、挑战西方思想不言而明的道德威望与全球影响力的威胁。近年来，凸显西方话语霸权的针对中国发展道路及国际合作模式的种种贬斥话语在西方媒体上频繁出现，四下流传，西方针对中非合作政策和中非合作关系的种种妖魔化攻击言论亦此起彼伏。尽管这些话语和言论的真实用意公正者眼里并不难识别，但它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离间、中伤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事业，歪曲抹黑中国对非政策的作用。西方持续性的意识形态攻势在一定时期中已经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思想理念、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差异扩大，疏离感、分歧感加深，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的担忧、猜忌甚至排斥与日俱增。这一切在短期内已经对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损害。

然而，从长远来看，非西方世界在 21 世纪的发展是一个总体的趋势，而人类追求共同发展并促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走向公平合理亦是历史进步不可逆转的必然。在日益凸显的历史事实面前，西方的文化帝国、话语霸权和意在阻止延缓非西方世界发展的话语高墙是必将被打破的。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国家带着明显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的“民主援助”，终将逐渐暴露出它们真实的用意和企图，其虚假的道德面具和单方面的话语“优势”也将随之而丧失。其次，随着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发展的主角，以客观事实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经验为基础，发展中国家终究会作出自己的理智判断与选择，外来的别有用心离间与中伤终会归于徒劳。^①最后，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西方的话语霸权将提醒并推动非西方国家、人民及其知识精英日益重视国际思想竞争能力与本国民族思想原创能力的提升，这将促使非西方国家逐渐进入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沿领域，进入人类发展与现代性思想理论的高端。通过这样一种思想领域的自觉自信及持久艰苦的努力，非西方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能反映人类历史发展普遍经验、能满足国家民族发展要求、能支持对外平等对话的现代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从而在根本上结束思想和文化上

^① See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an Taylor, *China's New Role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9).

依赖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在现代性的元话语体系中生成中国与亚非世界的知识体系。

近年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在国家有关部门、大学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参与下发展迅速。短短几年间,在建立专业学术机构,填补研究空白、培养专门人才、出版学术成果、开展国际交流、参与国际合作研究、提升研究水平、发挥智库功能、服务政府、企业和公众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①其所取得的成果和发挥的影响,已改变了过去非洲研究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世界历史研究、外交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处于边缘的地位。非洲研究的基础性地位,不仅在其本身的成果中得到体现,也在与其他重点研究(如大国、周边、多边及全球性、现代性等研究)的交相互动中体现出来。随着多方资金注入和专业研究力量投入的增加,中国的非洲研究在物质条件改善、人力与学术资源加强、学科建设与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提升、官学紧密互动各方面不断推进,学术旨趣的中国特色日益鲜明,知识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扩大。^②可以预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非洲研究吸引的人力物力投入还会增加,其研究过程中的开放意识与自主意识、全球眼光与中国立场、非洲情怀与中国个性将在相互激荡中同步提升。^③我们也期待,以21世纪中非之间直接、主动和日益增强的发展合作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与话语源头,面对非洲大陆追求现代发展的宏大时代命题进行中国思考,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非洲研究力量和规模将逐渐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这种发展,本质上是与非洲在全球发展中的重要性、中非合作的长远战略意义和中国为实现和平发展战略而进行思想、知识与文化的系统建设要求相符合的。

①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经加强了对中国的非洲研究的历史梳理与总结,相关重要文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中国的中东非洲研究1949—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述要》,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5期;李安山《中非关系研究三十年概论》,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4期;李安山《20世纪中国的非洲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

② See http://www.focac.org/chn/xsjl/xzhd_1/t813131.htm.

③ 由中国主要非洲研究机构主办承办的“首届中非智库论坛”于2011年10月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中非学术机构间一个常设性机构化的思想交流平台,表明中非学术交流与思想对话日益活跃。

问题三 中国胸襟之非洲学:关切视阈与追求境界

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快速发展与现实要求相比,与西方发达国家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相比,与前面所提到的中非合作关系所受到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力相比,目前中国的非洲研究在学术质量、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社会服务功能等方面,还有大力加强、调整、改善的必要。在一些重大的核心理念与精神形态方面,还需要作出深入思考与精心安排。而如下几点是当下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第一,从总体上说,中国的非洲研究不能脱离中国和平发展和中非双方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的指引,也难置身于激烈的国际政治和思想文化竞争之外。在这一点上,毋庸讳言,非洲研究中的某些特定领域,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关切性的国际性学术研究。在此背景下,学术与政治、个人与国家、思想与现实之复杂关系如何,是一个特别需要明晰智慧与开阔心胸来把握的问题,简单地偏执一隅或排斥一方皆有损中国的非洲研究事业以及相应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交往中奉行五项原则,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是中国和平独立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原则。但是,从人类发展普遍追求和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出发,从非洲发展的要求和非洲政策的本意出发,中国可以也应当以合理善意的方式,努力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去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推进改革,促进开放,加快发展。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非洲发展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既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精神和原则。对在此过程中遭到的来自西方话语霸权的恶意的评论和贬损,中国有必要在政治上加以澄清和批驳。

第二,中国的非洲研究不可零敲碎打,大玉碎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在国家民族复兴大业、中国双方战略合作与亚非思想智慧重建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自身的目标、宗旨,积极主动地为国家民族的复兴与中非发展、合作提供精神启示与战略性的思想支持。就此来说,今日中国的非洲研究,特别需要有一种主体性的思想建构,一种开阔通达的战略眼光,一种整体宏观的发展布局与清晰畅达的路径选择,并由此境界逐渐形成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与中国气度。进而言之,中国的非洲研究,中国对

非洲发展问题与中非关系的研究,既要有“形而下”的工具层面、器物层面、操作层面的个案微观研究,也要有“形而上”的价值层面、精神层面、战略层面的整体宏观研究,既要有田野村头的调研考察与微观实证研究,又要有宏观理念与精神境界方面的战略追求,所谓“执两用中”,努力把握好“道与器”、“体与用”、“虚与实”之平衡与协同。

第三,必须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非洲发展的大势,排除干扰,按照中非发展、合作的长远战略谋划学科发展规划,选择关乎中非双方发展核心利益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而严谨的国际合作研究。应该立足中非合作关系现实中的紧迫与重大问题,不受西方舆论及话语之左右,以我为主开展中长期的思想创新与知识积累。同时,需要大力加强与非洲学术界、智库、媒体界的交流合作,巩固和扩大中非共同利益与观念共识。这方面,需要对中国的对非援助作出适当的调整变革,增强对非洲国家学术机构与智库的能力建设合作。

近年来,一些非洲国家的思想界、学术界的民间智库组织,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关注中国发展的经验与得失,寻求与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交流合作,并在许多场合提出过合作倡议。对非洲国家社会思潮与舆情的变化,中国应该积极把握,顺势而为,通过检讨以往对非政策体制和理念中存在的不足,消除障碍,使援助非洲的事业和工作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当前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是,以往中国对非援助主要是中国政府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官方关系,非洲的各类民间组织与智库一般无正常渠道直接获得中国的援助。而西方的对非援助却往往直接面对非洲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与智库。

从中国对非援助的理念与原则上说,多年来中国一直恪守“不干涉原则”及不主动输出中国政治思想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不参与国际的思想竞争与合作,因为国际思想高地是一个不同思想观念激烈竞争的领域。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中非合作发展的快速发展与中国影响力在非洲的提升,来自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念促进了非洲社会发展思想和政治发展理念的积极变化,而非洲的稳定和发展与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以积极主动的合作姿态和政策,推动非洲的改革,促进非洲的开放,加快非洲的发展,提升非洲的能力,越来越成为中国应予以关注的战略性课题。中国

应该以积极而稳妥的方式，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非洲内部事务的发展，在把握双方共同的利益与合作空间的基础上，帮助非洲尽力消除那些出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明显妨碍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障碍，支持非洲国家的改革进程。在这方面，中国需要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国际政治立场，而不需要理会那些来自外部的莫须有的说三道四。

思想与行动其实是一枚硬币之两面。从全球比较与中国经历的多维视角上看，我们认为今日非洲发展的根本性障碍，集中在一些基本的制度性、观念性与结构性困境上。而帮助非洲国家逐渐消除这些发展的障碍，是中国可以有所作用的特殊领域。

非洲国家面临的第一个大的问题，是国家能力与政府执政功能的长期缺失，许多非洲国家日益处于“有社会而无国家”的国家体系消解与政府功能退化状态中。笔者始终认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上看，独立后的非洲，面临的首要问题或最大任务，是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建构、国家基础能力培植与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管理体系成长。^① 我们知道，在今日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无国家保护与缺失政府管理能力的情况下而得到发展。无论选择何种政体，奉行何种主义，是搞多党制还是一党制，都应该有助于非洲国家的稳定存在与政府能力的成长。事实上，为逐渐推进统一国家建构与民族融合，推进国家认同与爱国情感，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也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内外因素的干扰而一波三折，进展缓慢。首先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日益严重地从外部消解着非洲国家的主权，侵蚀着非洲国家的主权权威与行动能力。当代非洲国家是全球范围内最后跨进民族国家行列者，是世界上最后一批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与当年西方现代国家建构时，全球范围而处于相对独立分隔的独立状态不同，非洲国家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全球化进程和西方强势力量的外部主导与支配，国家主权与独立性始终面临根本性的外部侵蚀威胁。其次是在国家一体化建构和认同远未完成的情况下，非洲国家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照搬西方竞争性选举政治，结果往往引发内部分裂，导致持续的族群冲突，这又从内部侵蚀着非洲国家统一主权与国家统一治理能力。此外，近二十年来急速涌现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及其

^① 参见刘鸿武等著《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当代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广泛产生的不同族群间的对抗性政治诉求,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内部消解了非洲国家的政府权威与行动能力。

在今日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能力严重缺失,基层政权形同虚设,看不到条块分明、上下联通的功能化的政权网络与管理系统,在有社会而无政府状态下,千千万万的百姓苍生在广阔无边的草原和沙漠中陷入一种无助的、自生自灭般的艰难处境。国家统一体制的消解和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丧失导致了巨大的灾难。虽然今日非洲国家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有大量的年轻人口,却因缺乏国家与政权组织者和组织动员机制将他们组织成国家的建设大军,庞大的人口资源无法转化为服务国家建设的人力资源与生产要素。在今日许多非洲国家,那些蔓延四溢的巨大城市贫民窟,那些因国家瓦解而形成的庞大的难民营,动辄就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口,因为没有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功能,人们在其中只能无所事事,如尘沙般游荡生存。国家制度的建设与行政能力的建设,绝不是通过一场选举就能解决的。而西方开具的药方,提出的条件,却除了选举还是选举,这让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和民生在散乱无序的境地中一天天坠落深谷。

非洲国家面临的第二个大的问题,是许多国家在过去数十年中始终没能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长期忽略经济发展这一根本目标而深陷无谓的空头政治纷争之中。多年来,西方在非洲推进的政治变革政策,归纳起来就是过度迷信选举政治和投票功能,以为只要有了选举,有了多党制,一切问题就会获得解决。但劣质选举政治与无序政党竞争使国家的任何长期规划与发展都无从落实,政治许诺盛行,短期行为泛滥。多年来,非洲大陆空头政治充斥,政治挂帅盛行,选举迷信左右一切。然而事实上,对于今日的非洲国家来说,社会发展才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建设才是最大的政治。贫困与落后是一切动荡、冲突甚至恐怖主义的源头。不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努力改善民生,不保持一个稳定有效的国家体制,一切都无从谈起,政府也迟早要垮台。过去几十年,无论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还是议会政体的民主政府,许多非洲国家的执政者都没有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放置在工作的首要位置上,缺乏推进经济增长的意愿与能力,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一直陷于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之中。如何走出政治迷信的误区,不再执迷于选举崇拜,不再就政治谈政治,而是一心一意谋发展,一心一意求国家稳定,实在是非洲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核心问题。非洲国家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应该是

如何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进，而不是如何将自己的政治变得与西方一样。

就此来说，今日的非洲国家，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场拨乱反正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需要结合非洲的实际认真思考非洲的发展道路，探寻非洲问题的非洲化解决。非洲必须形成自主思想与独立精神，提升本土知识分子独立观察与思考自己国家发展道路的意愿与能力，振兴本国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形成独立自主的知识精英阶层。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与非洲国家开展交流，以实质性的举措来支持和帮助非洲国家思想智库的自主发展与能力建设。具体来说，中国不需要跟随西方搞意识形态对抗，也不需要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但中国可以用自己追求国家民族复兴进程的经历及所累积的经验教训来观照对比非洲的发展困境与发展难题，可以与非洲国家开展更广泛的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探究非洲国家解决其发展难题所需要的思想智慧与政策方案。通过与非洲思想界学术界的密切合作，共同来探讨非洲如何获得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保持国家稳定、增强能力建设。

为此，中国需要对传统的对外援助方式作出某种程度上的战略性调整，规划一个具有长远性、战略性的“当代中国国家思想与学术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走向非洲，走向发展中国家，逐渐扩大“中国知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影响力。在保持以往且行之有效的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援助的同时，重视有助于非洲国家思想创造能力与学术研究能力提升的“软援助”。

从长远的战略高度上看，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竞争领域，中国不仅需要重视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更需要重视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发展权”、“话语发展权”。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十分清晰的立场表达，立足于中国方位提供全球性的推进和维护发展中国家、非西方世界权益的思想框架与知识产品。国际化与全球化应该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包括非洲研究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取向。中国需要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库走进中国，积极支持中国的学术思想机构走进非洲，让中非双方的学者能在国际学术与思想高地上建构各自的国家话语平台。具体而言，一方面，积极推动中非双方建立研究对方的各类研究机构，如在中国高校中建立更多的不同学科支

撑的非洲研究中心,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建立非洲翻译馆以开展中非文献互译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支持和推动非洲国家的大学、政府机构、NGO建立各种类型的中国研究中心,推进孔子学院的本土化进程,将汉语教学纳入所在国家的国民教育体制中,同时在非洲建立联合报社与合作出版机构。通过这样一个日见开阔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平台,通过中国国内发展经验的国际化进程,来汇通整合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并逐渐将中国知识与中国智慧转换成一种可被外部世界理解与感受的话语形态,让非洲国家的人民有更畅达有效的途径来接触了解中国。这一切,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的实施,对于中非的发展合作战略的可持续推进,都有持久而重大的意义。

问题四 中国气度之非洲学:整体关怀与全局统揽

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创新与思想提升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总体上看,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形态与理论体系,都是在过去两三百年西方率先兴起的过程中由西方世界建构起来的。这一西方主导的知识与思想体系,虽然在解释非西方世界事象方面局限性日益明显,但它迄今依然占据国际思想与学术界的中心位置。如何打破西方思想与话语垄断,确立中国的非洲研究的思想自觉与话语自主权,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总体上看,一来应该是既不迷信西方,但又对其所代表的当今国际流行话语与知识传统有充分的了解,在消化吸收其合理内容的过程中超越其局限,二来必须从亚非自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的系统总结中重新建构新的知识体系与价值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历来注重整体把握世界、重视对历史大势作宏观把握的中国学术传统,是可以深度挖掘利用的思想宝库与工具来源。^①

从表象上看,非洲研究涉及非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方方面面,其研究者和对象分散在众多学科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分散性、交叉性。以一门“非洲学”,将这些分散而交叉的不同学科统摄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不太可能。然而,如果进行一些深入的思考,从非洲大陆的历史

^① 刘鸿武:《中国式价值在非洲》,载《社会观察》2011年第7期。另见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c/2047/59321/59314.shtml>。

与社会现状，以及当代非洲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复杂问题的分析中，仍然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非洲研究”（诸如非洲政治研究、非洲经济研究、非洲文化研究、非洲教育研究、非洲国别研究、非洲区域研究、非洲专题研究等等）的内在的关联性，从而以一种整体和联系之眼光，从中发现那些将各种各样之“非洲研究”统摄起来，将“非洲学”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交叉学科性质的“统一学科”来建设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风格与气度的理由。

具体言之，第一，虽然从古代迄今，非洲大陆内部各地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而与外部世界又有着复杂多样的联系与交往，东西南北之间与外部世界的亲疏状态各有不同，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非洲研究的国别、个案、微观研究的原因。但另一方面，非洲大陆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自然地理单位，其历史文化形态与政治经济特征，还是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性、整体性与一致性，一些明显有别于外部世界其他文明与文化的共同特征，一些有别于欧美、中东、南亚与东亚文明的属性。这些内在的联系性与整体性，提供了建构一门具有统摄性的“非洲学”的可能性与现实基础，使我们可以也有必要将非洲大陆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来进行把握，来探寻研究非洲大陆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因此，当代中国的非洲研究在注重学习借鉴西方非洲研究重视微观、个案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学术重视追寻“大道”、探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思想传统，透过非洲大陆纷乱复杂的当下迷局，看清这块大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把握到这块大陆的根本出路在哪里，举其纲要，观其大势，从而对非洲大陆之现状与未来作出更具历史眼光的战略把握。^①

第二，与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都具有南北关系不同，非洲大陆是一块几乎全部是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大陆。作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整个非洲大陆的54个国家全部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是这块大陆所有问题的纽结、焦点与源头，整个大陆

^① 宋代学者苏轼曾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见葛立方《韵语阳秋》）这“意”，大致应该就是散布于各知识领域背后的统一灵魂与核心精神，统摄各种专门知识与研究活动的相互联系与整体结构。参见刘鸿武著《故乡回归之路：大学人文科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54个国家都面临着谋求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共同发展任务。今日之非洲大陆,看似纷乱不定,动荡不居,但万变不离其宗,贫穷落后,经济衰退,民生艰辛,实是百恶之首、万乱之源。发展才是硬道理,无论何种理论,何种妙方,其合理性只能从是否适应增进非洲发展这一根本要求来判定。为此,必须形成一门以发展为核心理念、以发展为核心宗旨的相对统一的学科,来对非洲这块大陆的共同问题、基本问题进行具有战略眼光的整体把握,来开展知识积累、思想创新与工具创造,形成可以解释、促进并适合于非洲大陆现实需要的知识与思想体系。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可以围绕着非洲发展问题和中非发展合作来建构有中国气度、中国胸襟的非洲研究,来统摄整合中国非洲研究的各种资源与力量,追求共同的目标宗旨与内在灵魂。通过这种努力,中国的非洲研究学术理念与知识体系将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形上之道”与“精神境界”,将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学理体系与知识平台,从而在全球的非洲研究领域形成独特的“中国学派”。^①

第三,事实上,对中国来说,由于自身正在经历着相同或相似的发展变革,并且今日在总体上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样共同的国家身份与地位,使得中国可以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地体会理解非洲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可以动用自身在过去数十年经历和积累起来的种种有关发展的正反经验与教训,来理智观察、综合思考与内外比较非洲的发展及与发展相关的种种问题,从非洲的实际需要来探寻非洲问题之解决方案。中国问题的解决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非洲问题的解决也一样只能从非洲的实际出发。学术研究的最高智慧,来自心灵的感悟,来自研究者主体的切身追求。中国人因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个性,长期以来一直与那块遥远的非洲大陆有一种情感上的相互尊重,中国也一直对非洲大陆的现实与未来,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期待与信心,因而不自居思想与道德高地对非洲国家发号施令,而是主张平等对话,相互学习,交流互鉴。这是中国的对非政策不同于西方对非政策的地方,也应该是中国的非洲研究与西方的非洲研究之所以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学术界研究非洲问题之优势所在,同时更是中国的非洲研究实现学术创新,摆脱长期以来对西方思想与知识的跟随依附状态

^①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中国学派创立问题,可参见秦亚青教授《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与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的机会所在。

第四,长期以来,非洲大陆一直在努力寻求自己的共同属性并为实现非洲大陆的统一而奋斗,以非洲统一联盟和非洲各次地区性组织为基础的非洲统一运动与一体化也在不断推进。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虽然非洲大陆内部也有许多地区差异、国别差异、民族差异,但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在许多时候往往还是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一个相对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来认知、交往与对待。比如中非合作论坛,就是中国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而建立起来的中国与非洲大陆 54 个国家的一种特殊的“国家—地区”关系。

总之,非洲大陆的这种相对统一的整体性质,使得我们在研究非洲大陆时,确实必须也有可能建立一门专门以研究非洲大陆整体性问题、一般性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科,培养专门从事非洲事务和中非关系的高级专门人才。正如我们说“世界历史”并不是国别历史的简单相加一样,这样的非洲学学问与知识体系,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单一的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所能涵盖和支撑的,必须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创新性综合,将“区域研究”与“领域研究”相结合,形成一门新兴的“非洲学”交叉学科,其在学识视野与思想平台上才能胜任对非洲问题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综合需要。

问题五 中国视野之非洲学:概念推演与思想维度

作为一门反映中非发展进程、包容整合各类非洲研究学术、体现中国的非洲研究思想内涵与学术个性的特殊语境的专门学科,非洲学在一般概念与定义上可做如此初步的考虑。

第一,就学科定义与内涵而言,我们认为“非洲学”可以这样来表述:它是一门专门以非洲大陆的人文与自然事象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对此定义,还可以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非洲学”,包括一切以非洲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与思想领域,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各领域所涉及的非洲问题研究。而狭义的“非洲学”,则主要是指以非洲大陆之文明进程及当代政治经济发展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学科,类似

于“非洲文明研究”或“非洲发展研究”。

第二,作为一门综合交叉性学科,今天的“非洲学”,需要以综合的方式,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的诸多知识工具与理论形态,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类学、艺术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对非洲大陆文明与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行综合性与整体性研究。而在当代,随着对当代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日见深入与拓展,诸如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国家建构理论、国家治理理论、人口控制与环境发展理论、科技运用与技术开发理论、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理论等新兴学科与边缘学科,也将涉足且包含在内,形成“非洲学”广泛综合的知识和理论背景。

第三,关于“非洲学”与“非洲研究”两个概念之异同及取舍择用问题。“非洲学”或也可称之为“非洲研究”,在许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应该说,使用“非洲研究”这一概念也有其优长之处,因为这一概念表述的内涵十分清楚,无须特别解释和说明,但凡与非洲有关之学术研究,皆可统称“非洲研究”。但另一方面,如使用“非洲学”这一概念,则更有另一番深意与追求。首先,“非洲学”突出了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学习系统性、理论性、学科性,而“非洲研究”却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主要表述了研究的对象,陈述着一种研究的过程,并无明显的追求自身之学科体系、理论形态、学术境界的主体建构含义。及次,由于这两个概念传递或表达出的学术蕴涵与思想品质可能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如果长期使用“非洲研究”而避开“非洲学”则可能不利于这一学科的自身理论追求与学科主体意识的自觉,结果可能导致这门学科始终只是一些与非洲有关的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聚集。因此,通过“非洲学”概念的更广泛而准确地使用,有助于促使学术界更多关注非洲研究的理论旨趣与学术境界之追求,更多关注非洲研究的学科发展路径与体系建构过程,如此,则非洲研究更有可能上升为一门日见成熟且相对独立的知识学科。

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一门交叉性的新兴学科,其在学术旨趣与思想维度方面,应该表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通过对非洲文明及其相关成长背景作出整体上的研究与综合性的把握,努力揭示出非洲文明的总体轮廓与基本结构,努力把握非洲文明发生、发展的基本历史进程与现实走向。同时,该学科还旨在从世界文明

体系的开阔视野上，以比较和联系的眼光，深入探究和揭示非洲文明的个性精神与世界意义，它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它与世界其他文明之相异与相同，以及这些异同之缘由，从而更好地揭示古老而又现代的非洲文明之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个性形态、发展品格与演进特征。由于“非洲学”在研究对象与学术旨趣方面的上述特点，决定了该学科所需要运用的理论形态、知识体系与研究工具必须具有开阔的背景、跨学科的视野、交叉性的特征。

第二，中国特色的非洲学，应该特别关注进入近代特别是当代以后，在整个世界历史宏观环境和非洲大陆历史命运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条件下，非洲文明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变迁转型过程，这些变迁转型的复杂而矛盾的特点和性质，以及它与当代非洲大陆现实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关系，努力从传统文明特性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当代非洲国家复杂的现代政治经济发展问题。通过对非洲文明的深入把握来更好地理解当代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当代非洲追求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作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兴学科与交叉性学科，该学科应该特别追求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理论体系与知识工具，及学科发展的现实运用价值，特别重视结合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之实践，关注当代中国与非洲大陆在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进程中所开展的发展合作与文明交流，探讨和比较中非双方当代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复兴方面彼此相关的一些共同命题。

第三，“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之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秉承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三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或许可以作为未来时代中国之非洲学建构过程中努力追求与开拓的某种学术境界与思想维度，某种努力塑造的治学理念与学术品质。所谓“非洲情怀”，是想表述这样一种理念，即但凡我们研究非洲文明，认知非洲文化，理解非洲意义，先得要在心中去去除对非洲之偏见与轻视，懂得这块大陆之人民，数千百年来必有不凡之创造，特殊之贡献，必有值得他人尊重之处。我们应该对非洲人民、对非洲的历史文化，怀有一份“敬意”与“温情”，一份“赏爱之情”与“关爱之意”。或许，有了此般非洲情怀，有了此般非洲情结，方能在非洲研究这一相对冷寂艰苦的领域有所坚持、有所深入，才愿意一次次地前往非洲，深入非洲大陆，做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实地研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

和观察去研究非洲,感悟非洲文明的个性与魅力。由于非洲大陆内部存在巨大的地区间、国家间、民族间差异,因而研究非洲大陆的问题时,不仅要有大陆的宏观眼光,更需要有大陆内部的区域、国别、民族甚至村社的微观眼光,既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非洲大陆的基本属性,更需要对非洲文明的地区结构、国别结构、民族结构进行微观个案的研究,深入非洲大陆做长期的实地调研、田野考察,特别注重研究者本人对非洲大陆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的个人心灵体验和感受。所谓的“中国特色”,在于表明,今日中国对非洲之认知,自当站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上,站在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丰富实践的基础上,秉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持中之学术传统,以中国独特之视角、立场与眼光,来重新理解、认知非洲文明及当代中非关系。这种立场,一方面需要了解 and 借鉴外部世界对非洲的相互认知与感受,尊重、借鉴、汲取西方学者过去百年创造的学术成果,但同时并非简单地跟在西方的后面,如鹦鹉学说他人言语。毕竟,作为中国学人,若要真正深入懂得非洲文明,前提之一,也须对中国文明个性、对中国学术传统有一份足够的理解与掌握,如此方能知彼知己,并有所比较,方能真正看出中国文明与非洲文明之相同与相异,共性与个性。最后,所谓“全球视野”,是说在今日之全球化时代,在今日之世界相互牵连、多边互动之格局下,我们无论是认知非洲文明,还是认知中华文明,自然都不可只限于一隅之所、一孔之见,既不只是西方的视角,也不局限于中国的眼光,而是应有更开阔之全人类之视野,有更多元开放的眼界,在多维互动、多边对话的过程中,理解中非合作关系之适位、可为与当为,并进而寻求人类之共同理想与普遍情感。并且着眼于 21 世纪人类发展前景,努力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史大视野上,对东方社会、亚非社会的传统文明遗产的现代重建、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及不同文明之平等对话与交流等这样一些更为一般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出本学科的特殊探索与思考。

今天,不论是从非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在 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升来看,还是从中国与非洲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来看,抑或是从中国与欧美国家及新兴国家在非洲的博弈需要来看,加强我们对非洲研究与学习都是当务之急;同时,由于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国内学术界在进行欧美问题、亚洲问题的研究时,越来越多地牵涉到非洲方面的问题,非洲学成为整个国际问题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话题,非洲学的深入研究与高级人才培养会成为推动国内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国内高校的各类学生对非洲知识的渴望和对非洲研究的兴趣都在不断增加,许多高校为本科生开设的有关非洲方面的课程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中国的非洲学要获得健康稳定发展,除上述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外,还需要在这样一些基础性条件方面作出努力。第一,需要在国内各大学建立起一批实体性的、能长期稳定存在并有相应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的非洲研究专门机构,并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国际交流功能为一体。第二,需要拥有一批专门化的、热爱非洲研究事业、长期致力于非洲研究事业的科研与教学队伍,这些人需要来自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等不同的学科背景,具有赴非洲国家访问、考察、调研的经历,具备跨学科协同展开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能力。第三,形成培养高水平非洲学研究生的专业条件与硬件环境,包括非洲专业图书资料中心、非洲博物馆、非洲图像影视中心、非洲网络数据库的系统化建设。涉及非洲研究领域的各专业研究生能有多种途径赴非洲国家实习考察,或与非洲大学联合培养,在当地学习本土语言,感受当地社会与文化,以为将来进行更具学术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专门研究建立基础。

结 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与努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复兴已经有了重大进展,并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在此阶段上,发展中国家的思想自立与知识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过去,西方世界总体上是不认为发展中国家会有自己思想形态的,也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思想权利。也许,这是一个南北力量真正交锋、碰撞与对峙的领域,但也可能是一个东西方思想话语优势发生主客场转换的关键领域。就如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学一样,中国也需要发展自己的非洲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21世纪,中国将持续追求在和平发展中重新崛起并为世界进步作出新的贡献。对此,世界在观察中,有期待、有疑惑、有防范,无论如何,目标

与诺言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中国自己的选择与国内的发展状态”。^①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一个奉行和平道路的文明古国。远在古代，在自身文明的视阈以内，中国人就建立了古人称之为“天下”的世界情怀，建立起了具有普世色彩的“大同”理想，其中的宽广与远大，在根本上支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在思想领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今日与未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取决于中国在思想创造与知识产生方面在国际上的位置。可以说，作为当代中国学术的“新边疆”，中国的非洲研究学者依然任重而道远，学者们尚需放开眼界，敞开胸襟，以一种举高慕远、通而观之的历史大视野来认知研究非洲及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有中国胸襟的“非洲学”学科的建构，作出当代学人的思考与探索。

^① 王逸舟：《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二），载《当代世界》2011年第2期。

Summary

International Ideological Exchange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chool” -Rethinking the Implications and Goals of Constructing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Liu Hongwu, Professor, General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efforts-taking exploration, the vast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made impressive advances in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and reached a new crossroad in history. In the new phase,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independence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bears particular importance. As one of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t only the need for China to value and secu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ight of development countries, but also the right of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ower of discourse. It has been a time-honored principle that China upholds that different ideologies and cultures of the mankind are compatible and equal in nature and believe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hold the creativity and entitlement of developing their own ideological system. Nowadays, more extensive exchanges are ought to be carried out between academia from China and that from Africa in an effort to develop a brand-new discipline of African studies featured a core notion of development through joint academic research. This new discipline will have a holistic and strategic focus on the topics of common concerns to Africa as well as some fundamental questions. It is expected that ideological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Africa will be given impet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inent will be backboneed by its own knowledge and ideology. In the process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will gain its own characters and formulate its own theoretical system and knowledge platform and an unique “Chinese School” in the field of African studies will be incubated against a global background.

Key words: Academic Ideolog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African Studies

Youth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People’s Revolution in North Africa

Zhou Yuyuan, Doctor,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frica’s Population Bonus has been playing a bi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but meanwhile, it also poses great challenges.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Youth in North Africa against politics of despair has reflected that African is experiencing severe problems in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which also demonstrates the generational gap between the Youth and old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or old order is growing bigger.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which can explain why Sub-Saharan Africa is not probable to happen with the political changes like Tunisia and Egypt, Such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outh in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als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outh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 However,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more severe challenges.

Key Words: Youth; Africa; North Africa;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Security Nexus in East Africa’s Regional Integration

Zhang Chun, Doctor, Shanghai Institute of African Regional Studies

Abstract: What’s the reason behind the recent rapid development of East Africa’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first decade of 21st century that it has experienced failure in the first decade after the de-colonialism and stagnation from 1970s to 1990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eason lies in